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 朱海燕

〔提　　要〕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关 键 词〕日本、北约、战略协调、亚太安全

〔作者简介〕朱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3）5 期 0117-21

2023 年 7 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北约峰会，与北约签署升级版的合

* 本文为 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俄罗斯的中亚政策”（项目号：22FGJB024）、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大项目”（项目号：2022ZYRZ05）、2023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及中国的对策研究”（项目号：23ZYYB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文件，即《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the Individually Tailored Partnership Programme：2023-2026, 以下简称 ITPP)，标志着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提质升级。在世界大变局深度演进背景下，北约不断推进“亚太化”进程，而日本则积极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这促使双方安全战略协调与互动日趋活跃。日本与北约的战略互动是大变局深度演进的产物，将对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演进产生深远影响，双方以中国为指向的安全战略互动也将给中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深入分析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

日本与北约同为美国主导的全球盟伴体系的重要构件，双方在冷战期间即有所接触，但并未形成规律性、实质性互动，双方的对话仅停留在就个别事件进行临时性、偶发性沟通层面。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追求“大国化”的日本与不断“亚太化”的北约取得战略关系的突破性进展，逐渐在高级别政治安全层面建立起规范性、制度化的关系互动框架，安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进程不断深化。

（一）政治关系升级至最高级别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接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中导（INF）问题的讨论，但冷战期间双方的政治接触仅限于偶发性、临时性安排。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日本与北约的政治安全关系有所提升，外交往来密度不断加大。2006 年，麻生太郎作为日本外相首次访问北约总部，称“日本重新发现了北约的重要性……日本将探讨在宪法框架内与北约合作的最合适方法”[1]。2007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约理事会并发表演讲，称“日

[1] 「麻生大臣の NATO 訪問」、データベース「世界と日本」、2006 年 5 月 4 日、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exdfam/20060504.S1J.html。

本和北约应该向合作新阶段过渡”[1]，这是日本政府首脑首次出席北约决策机构的会议。2013 年 4 月，日本与北约签署《联合政治宣言》，称“日本和北约间关系的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和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2]，双方将推进在反恐、网络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这使日本—北约政治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成为可能。2018 年 7 月，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运行，这是日本在北约总部设立的首个官方机构，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将提升与北约政治安全关系的强烈政治信号，该机构进一步推动双方政治关系升级。

乌克兰危机升级成为驱动日本—北约关系突进的重要契机，日本与北约以维护所谓“以规则（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借口，构建起最高级别的政治对话关系。2022 年 4 月和 6 月，日本外相林芳正与首相岸田文雄先后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和北约首脑峰会。岸田表示，日本将大幅提升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并以“欧洲的安全与亚洲安全密不可分”为噱头，期待北约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3]2022 年 5 月，山崎幸二统合幕僚长作为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北约参谋长会议。2023 年 1 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应邀访日，宣称“由于难以预测的乌克兰及‘印太’地区局势，为进一步维护与强化‘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一致确认将提升合作层级”[4]，并探讨了日本定期参加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的可能性等。为彰显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斯托尔滕贝格访问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入间军事基地，并进入作为主力机型的 F-2 战斗机驾驶舱。2023 年 4 月和 7 月，林芳正与岸田再次先后受邀参加北约外长与首脑会议，岸田作为日本首相首

---

[1] 安倍晋三、「日本と NATO: 更なる協力に向けて」（仮訳）、外務省、2007 年 1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112.html。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oint Political Decla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pril 13, 201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99562.htm.

[3]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2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

[4] 「岸田総理とストルテンベルグ NATO 事務総長との会談」、外務省、2023 年 1 月 3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6_000806.html。

次在北约首脑峰会发言，进一步彰显了“没有任何其他伙伴比日本更接近北约”[1] 的定位，对外宣示日本与北约密切的政治关系，也预示着基本形成日本“常态化”参加北约外长、首脑会议的新关系框架。

（二）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对话关系始于 1990 年 6 月在比利时举行的第一次“日本—北约安全会议”，同时启动的对话机制还包括“日本—北约高级别磋商”及“日本—北约安全研讨会”，基于此，北约将日本视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欧洲国家以外“与北约接触的最资深的国家”。[2]

在不断扩大的合作实践及深化合作的需求推动下，2004 年北约将日本纳入“接触国”行列，2008 年日本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正式开启制度化合作进程。2010 年，日本与北约签署《情报保护协定》，这是继 2007 年日美《情报保护协定》后日本签署的第二个此类协定。2014 年，双方签署《日本—北约国别伙伴合作计划》（Individual 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Programme between Japan and NATO, 以下简称 IPCP），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具体内容、方式等规划了行动路线图，引导日本逐渐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安全行动。至此，日本与北约间的安全合作摆脱了事务性、临时性合作模式，步入机制化运行轨道，也标志着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由“具体事务”合作进入以应对“假想威胁”为目标的合作框架，打通了双方未来继续拓展合作领域的通道。同年，日本向北约总部派遣女性自卫官，这是日本首次向北约派遣自卫官，开启了双方在安全领域进行“人的合作”进程。其后，2018 年、2020 年双方对“合作计划”进行了修订。2022 年 4 月，双方提出将 IPCP 提升为 ITPP。2023 年 7 月，日本与北约正式签署 ITPP（2023~2026）。文件规定，双方将提升军事安全力量间的互操作性与互适用性、提高联合演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Remark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Fumio Kishida,” July 12,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7083.htm.

[2]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Opening Statement by Secretary General Jaap de Scheffer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with H. E. Mr Taro Aso,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May 4, 2006, https://www.nato.int/docu/speech/2006/s060504a.htm.

练频率、强化情报信息与经验合作、加强在无人机武器研发和使用规则制定方面的合作，这为双方未来安全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政治法律保障。2023年1月，日本与北约探讨在东京设立联络办事处的可能性及相应程序。根据规划，该办事处将作为北约在亚洲的联络机构，日本负责收集亚太地区的军事信息等与北约共享。此外，日本2023财年还制定了向北约派驻专门的外交使团、常态化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等计划，以拓展和充实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关系。

（三）非传统安全合作由虚向实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与北约间的安全关系停留在口头交换意见的“务虚”层面。“9·11”事件开启了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由虚到实的转变。此后，双方非传统安全合作关系又以网络及新兴技术等领域为重点，获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1月，日本提出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以下简称CCDCOE）的设想。2019年3月起，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员以研究员等身份参加CCDCOE的活动。同年10月，日本与北约建立“网络防御相关职员会谈”机制，围绕网络安全议题进行情报共享和意见交换，探讨“基于共享的价值观的网络防御通用方法”。[1]2021年，日本防卫省、内阁网络安全中心、警察厅、民间重要基础设施企业等网络安全相关部门组队参加北约“锁盾”演习，并成为演习的正式成员。2022年11月，日本正式加入CCDCOE，成为继韩国之后第二个加入该组织的亚洲国家。2023年4月，日本作为成员国，派出防卫省内部部局、联合参谋部、陆上自卫队系统通信团、海上自卫队系统通信队群、航空自卫队作战系统运用队、航空自卫队航空系统通信队、自卫队网络防御队、内阁网络安全中心、总务省、警察厅、信息处理推进机构、日本计算机应急小组协调中心、重要基础设施运营商等网络安全相关部门组成的庞大的代表团全程、全域参加CCDCOE网络安全联合防卫演习，展示了日本积极推进与北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and Japan Intensify Dialogue on Cyber Defence,” October 9,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news_169493.htm.

约在网络安全领域深度合作的政治意愿。在国内体制建设方面，日本将加速构筑主动网络防御（Active Cyber Defence）体制，推进与北约网络安全领域的共通性建设进程。

（四）传统安全合作从无到有

日本与北约的传统安全合作主要限于联合军事演习层面。2014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首次在亚丁湾举行联合演习。2018 年，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2022 年 6 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北约常设海上第二大队再次在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8 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格鲁吉亚参加北约“高贵伙伴 2022”军事演习。2023 年 6 月，日本作为除瑞典外唯一非北约成员国，参加了北约“空中卫士 2023”演习，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北约的空中军演。该演习被称为北约史上最大规模的空中军演，演习内容包括空中支援地面部队、空对空作战、拦截中程导弹以及机场疏散等课目，目的是加强跨大西洋军事合作，强化北约应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日本通过在演习中与北约军事力量进行实兵对接、实现军事赋能，[1] 提升应对高强度军事冲突的能力，强化双方军事安全合作。

此外，日本还参与了北约科学技术组织（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即 STO）及北约和平与安全科学计划（Science for Peace and Security, 即 SPS）等相关项目，为日本与北约就军民通用技术的联合研究提供了平台，也有利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操作性与共通性能力建设。

二、驱动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因素

日本与北约在战略对视中不断接近，并逐渐提升战略协调关系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1] 安峥：《北约最大规模空演登场，“秀”给谁看？》，《解放日报》2023 年 6 月 13 日，第 8 版。

（一）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组织性动力源

美国既是北约的“灵魂国家”[1]，也是日美同盟的主导国，在北约与日美同盟战略走向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美国认为，“欧洲盟国在‘印太’地区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高度符合美国利益；同时，我们希望‘印太’地区盟国与欧洲盟国展开密切合作，携手塑造共同期望的国际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与中国的竞争。”[2] 为打造盟伴间的“共同战略愿景”，美通过接连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印太战略》等战略文件、领导人公开讲话、召开主题性国际会议等方式强化美国对“大国竞争”的叙事方式，以此敦促、诱使各国（国际组织）“选边站队”。在战术层面，为施压盟伴聚焦“印太”，美国通过一系列话语操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具有冷战意涵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将中国崛起描述为“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将中美在个别领域的矛盾与分歧升级为“战略竞争”，将中美矛盾置换成“中西矛盾”。实践中，美国以共同的战略认知为牵引，积极在盟伴间推动供应链整合与重构，并致力于打造集体军事优势，构筑国防工业的共同基础，实现相互间的互操作性安排，以此构筑美国与盟伴间共同的战略物质基础。在美国促动下，日本与北约在战略愿景、威胁认知、务实合作等领域的互动都呈现出明显的突进性，逐渐构建起以美国为中心、具有敏捷性与互操作性的“战略三角”。[3]

（二）战略需求是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内驱动力

日本的“大国追求”驱动其向北约靠拢。日本的“大国追求”以修宪强军为核心手段不断拓展，国际权益诉求也从确保安全转向追求权力。2022 年底，日本根本性调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的颠覆性举措是构筑“对敌基地反击能力”，试图以武力确保日本界定的安全利益，这决定了日本与

---

［1］ 李海东：《北约维护西方安全的原则和行动探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 年第 1 期，第 59 页。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3］ Mikayla Easley, “Japan Seeks Deeper Defense Ties with NATO,” National Defense, December 6, 2022, https://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2/12/6/japan-seeks-deeper-defense-ties-with-nato.

世界最大军事组织——北约的“亲近感”。日本试图“借船出海”，提升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存在感，扩大在国际秩序调整中的权力配额，同时，借口“盟友、伙伴国”需求，推动国内修宪强军的政治议程，使防卫力成为“大国追求”的强有力后盾与政策工具。2023 年 1 月，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北约支持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向。乌克兰也“赞扬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包括从根本上加强防御能力和外交努力”。[1] 由此，日本试图借助北约及其支持乌克兰的行动，逐渐塑造美西方主要国家（国际组织）接受其安保战略质变的共识，以造成既成事实并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手段，推动军事力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比的大幅提升。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佐证了美国作为安全提供者的不稳定性，使日本认识到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社会已由美国处于压倒性地位……转化为以中美为代表的国家间战略竞争时代”[2]。为确保自身既得利益，日本与北约加强战略协调，意在推动安全合作伙伴多元化，牵制美国的战略波动行为，防止陷入“被抛弃”的同盟困境。

北约介入“印太”地区事务是其与日本战略关系突进的内驱力之一。北约是扩张性军事同盟组织，不断扩张是北约彰显其存在合法性的内在需求。冷战期间，北约由最初 12 国扩大至 1990 年的 16 国，2023 年 4 月芬兰的加入使北约成员国扩大到 31 个。北约不断扩员、扩边为其他国家“入约”或以其他形式与北约构建安全关系提供了操作空间与政治可能性。在“印太”地区战略价值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北约积极转向并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将确保“印太”地区安全、稳定、繁荣纳入北约任务范畴，这成为北约追求生存合法性的新手段。

北约任务扩容为其与日本的安全合作提供了链接点。冷战后，北约以任

---

[1] 岸田文雄、「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首相官邸、2022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2] 『令和四年版外交青書』、外務省、2022 年 4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index.html。

务驱动战略转型与身份重构，逐渐从具有固定承载形态的区域性军事同盟组织，转向超越地理边界依托的安全应对型军事同盟，这促其活动范围与领域突破边界限制向全球拓展，伙伴国的选择也以战略价值及客观能力作为准则之一。2010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突出强调危机管理和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提出应“由军事行动的具体任务来决定联盟（coalition），而非由联盟决定军事行动的具体任务”[1]。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文件称，“北约面临的威胁是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的”，需“加强与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具有相同价值观和利益的伙伴的联系”，尤其应“加强与‘印太’地区新老合作伙伴的对话与合作”。[2] 北约认为，“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像日本那样与北约关系如此密切，也没有其他伙伴国家具备如此能力”。[3]

（三）携手应对“中国挑战”

日本一直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并以应对“中国挑战”为借口，强化与“同志国”的安全协调与合作。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将中国从“潜在对手”升级为现实对手，对中国的认知与定位不断趋向消极负面，对华政策由“对话 + 对抗”走向“对抗”前提下的“接触”。2021 年 10 月，岸田就任首相之初尚认为，“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我国将与共同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各国携手，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强烈呼吁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要保持对话，围绕共通的诸多课题开展合作”。[4] 至 2022 年 1 月，岸田施政演说中的对华政策已调整为，“对中国坚持应该坚持的主张……通过认真

---

[1] David Hastings Dunn, “Innovation and Precedent in the Kosovo War: The Impact of Operation Allied Force o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5, No.3, 2009, p.543.

[2] 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chi.pdf。

[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Joint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with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Yoshimasa Hayashi,” April 4,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3469.htm.

[4] 岸田文雄、「第二百五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21 年 10 月 8 日、www.kantei.go.jp/jp/100_kishida/statement/2021/1008shoshinhyomei.html。

对话，围绕共通的课题开展合作”。[1] 同年 12 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的认知下调为，“对确保日本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及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 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日本以“复读机”模式向国际社会不间断地输出“乌克兰的今天可能成为东亚国家的明天”[3]。在日本的叙事攻势下，“北约成员国和伙伴国广泛认可了这一点”[4]。

北约将中国视为挑战，驱动其与日本靠近。北约的中国认知呈逐渐负面化趋向。冷战后，转型中的北约“寻求与其他国际机构和关键国家建立有效伙伴关系的方式”[5]，中国一度被视为合作者。随着美国“重返亚太”，北约的中国认知更强调价值观的异质性及力量的竞争性。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加快，北约对中国的定位由竞争—合作转向“挑战”。2019 年 12 月，北约伦敦峰会宣言称，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其国际政策带来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6]2022 年 6 月，马德里峰会宣言的中国定位取消了“机遇”，突出强调“挑战”。2023 年 7 月，维尔纽斯峰会宣言更放大了“中国挑战”的内容及程度，宣称中国正“努力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包括在太空、网络和海洋领域”。[7]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尽管“北约仍将是北美与欧洲的联盟”，“但在北美和欧洲，我们面临着全球威胁和

---

［1］ 岸田文雄、「第 208 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22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117shiseihoshin.html。

［2］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 2022」。

［3］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外務省、2022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Foreign Minister Hayashi Attends the Meeting of NATO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April 5, 2023, https://www.mofa.go.jp/erp/ep/page4e_001264.html.

［5］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Christopher Bennett, Building Effective Partnerships,” July 1, 200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0606.htm?selectedLocale=en.

［6］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NATO Engages: Innovating the Alliance’ Conference,” December 3,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71550.htm?selectedLocale=en.

［7］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Vilnius Summit Communiqué,” July 11,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17320.htm.

挑战……中国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安全和利益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决定进一步加强与‘印太’伙伴关系的原因”。[1]

（四）“俄罗斯威胁”成为现实、直接的动力

和平条约缺位导致日俄相互信任关系极度脆弱乃至缺失，日本视俄罗斯为战略不稳定因素。2022 年 2 月，俄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对国际秩序变动保持超强敏感度的日本将此视为进一步摆脱“战后体制”的“天佑”。同时，为确保美国继续落实“印太战略”，日本需协助北约牵制俄罗斯。日本迅速放弃 2014 年以来在俄罗斯与 G7 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角色定位，宣称“日本和乌克兰有着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无理和无端侵略”，认为“维持和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对于限制俄罗斯进一步的战争行动是必不可少的”。[2] 作为回应，俄加大在亚太方向的军事部署及调动力度，特别是强化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军事存在，调整日俄间相关合作协议，更加重了日本的不安全感，这反推日本进一步强化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关系，形成了日俄关系的螺旋式恶化态势。

应对“俄罗斯威胁”驱使北约寻求与日本合作，以缩小对俄战略“包围圈”。北约不断东扩使其与俄罗斯间的互不信任逐渐累积。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自冷战后首次称俄“严重影响北约东部和南部的安全与稳定”。[3]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称俄是“对盟国安全及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4]。实践中，北约对俄进行了政治、经济、认知等全方位围剿，军事上则以支持乌克兰的方式间接参与了俄乌冲突。北约 2022 年版《战略概念》文件强调，北约将继续谋求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具

---

［1］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Pre-Ministerial Press Conference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June 14,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5673.htm?selectedLocale=en.

［2］ 岸田文雄、「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首相官邸、2022 年 6 月 1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Wales Declaration on the Transatlantic Bond,” September 5, 201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12985.htm?selectedLocale=en.

［4］ 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有共同价值观和利益、有意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合作伙伴”。[1]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拉拢日本，展示美西方国家团结的同时，亦可分散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并防止日俄进行战略交易。

此外，乌克兰危机中呈现出的新安全形态，完全超越传统地理边界，具有鲜明的跨域性、全球性特征，促使相关国家（国际组织）联手应对更为多元、复杂的新型安全问题，这既是日本与北约深化安全合作的动因，也是日本—北约 ITPP（2023~2026）的重要合作方向之一。

三、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面临的制约

虽然日本与北约的安全战略关系呈突进性发展态势，并在未来有望继续强化，但受制于诸多要素，双方短期内形成传统军事同盟关系的可能性不大。

（一）机制性约束

北约运行机制的牵制。北约虽称继续秉持“门户开放政策”，但其面向的范围仍限于“认同北约联盟价值观、有意愿、有能力承担成员责任和义务，以及加入后有助于促进我们共同安全的欧洲民主国家”[2]。在决策方面，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北约最重要的政治决策机构，在重大问题决策上，采取共同协商与一致同意原则。申请加入北约的国家不能与其他国家存在领土纠纷，而日本与邻国存在多项领土纠纷，这基本扼杀了日本“入约”的可能。此外，北约是由 31 个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各成员国的战略偏好各异，并非所有北约成员国均同等程度地关注亚太地区事务。虽然部分国家加大了在亚太地区战略投资，但北约“在印太战略方面的方针是不与任何人结盟……北约要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威胁”[3]。日本“拖欧入亚”[4]

---

[1] 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2] 同上。

[3] 王锴：《北约介入印太事务的前景分析》，《军事文摘》2022 年第 8 期，第 14 页。

[4] 《日本“拖欧入亚”历史是否又来到十字路口？》，《环球时报》2023 年 1 月 16 日，第 7 版。

的战略企图难以获得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是日本极力试图将其与中国不稳定的安全关系带入北约，将招致北约部分成员国的反对。法国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即是典型例证。当然，法国的反对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变化，但北约并非是无懈可击的整体却是事实。

日本国内机制限制其对外结盟能力与意愿。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权、不保有军事力量，这长期束缚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利，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防卫能力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它建构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心理惰性及行动惰性。虽然日本以“小步子、不停步”的策略逐渐摆脱宪法的限制，但在防卫力的现实使用问题上，与美西方国家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日本防卫力建设水平也面临着国内政治法律制度、政权结构、国内外舆论等客观限制。日本积极突破以宪法为核心的“战后体制”束缚，但相关举动均为伺机主观选择的结果，是传统的机会主义、功利主义思维催生的产物，只有在符合其国家利益时，日本才可能在谨慎评估后决策、实践。从战后日本自卫队海外派遣中也可看出，目前为止，其任务均限于国际维和、打击海盗、担当教官、建立海外活动平台、战后重建、医疗援助、人道主义救援、为美国等提供后勤补给、护航等低敏感度领域。即便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本在参与美国相关安全行动时，也保持了极为谨慎的姿态。可以判断，在国际局势尚未发生根本性剧变的情况下，日本仍将继续主动地利用国际格局调整的档期，推进国内政治议程，短期内不会以“入约”路径深度卷入欧洲—大西洋的纷争。岸田也公开表示，“日本没有计划以成员或准成员的身份加入北约”。[1]

（二）客观资源与能力的限制

长期以来，日本防卫力基本保持在“自卫”能力建设层面，尚未真正形成远距离、持续作战的实力。日本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处于常态化不稳定态势，极大牵制了防卫力的对外投送能力。此外，战后日本自卫队没有实战经验，

[1] 《岸田文雄：日本不计划加入北约》，《环球时报》2023 年 5 月 25 日，第 2 版。

也没有直接处置高强度军事危机的实践，这对各自卫队之间及其对外军事合作中的配合、联动、保障等互操作性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加之前述政治机制的限制，使日本在国际安全问题处置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实际军事能力、战略抑制能力、危机处置能力等缺乏客观经验性认知与评估，在战争及高强度危机环境中，日本与他国间的战略协作能力与意志将受到质疑。此外，日本财政紧张下的有限国防开支、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自卫队的纵向式作战结构等因素也极大限制了其与北约形成有效威慑联动的能力。

北约虽然实力强大，但其防区边界不断扩大、安全任务范围不断拓展，在相当大程度上稀释了其在实际作战行动中可用于部署的战略资源。北约各国在联盟成本、安全投入、责任分担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不同成员国的军事参与能力存在极大差异，难以贯彻现代战争要求极高的互操作性及敏捷性，给军事行动的实际效力带来负面影响，弱化了成员国的安全供给能力，限制了北约向防区外进行军事部署的执行力。现实中，乌克兰危机将使俄罗斯与北约进入新的军事对抗轮回，[1] 北约的战略重心将从全球范围内应对不稳定事态回到欧洲—大西洋等核心防区，并在强化内部整合的同时，加大对俄的战略围堵和挤压力度，进一步扩张在欧洲大陆的战略空间，“一个具有威慑力的俄罗斯将牵制北约区域外力量的扩展”[2]。短期内，日本—北约的安全合作将继续按照“因国施策”或“一事一议”方式进行协调，难以构建起具有威慑力的安全合作机制，[3] 深化和提升安全合作的共识更多停留于政治表态及协议层面，安全合作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三）主观意愿的不足

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牵制北约“亚太化”进程。北约虽将中国界定为“挑

[1] 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外交评论》2022 年第 6 期，第 85 页。

[2] 王媛媛：《北约战略新动向评析》，《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6 期，第 44 页。

[3] 孙文竹：《日本强化对欧安全合作的动因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战”，但其 2022 年版《战略概念》文件仍称，将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1] 这为双方未来接触保留了一定的外交空间。斯托尔滕贝格明确表示，“中国是重要的全球性力量……北约并不将中国视为对手，重视同中国保持和加强接触，对发展对华关系持积极态度。北约将坚持既定的地理范畴，希望同中方探讨军控、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合作，以更好应对全球性挑战……期待中方为结束欧洲战事发挥重要作用”。[2] 北约的相关文件及领导人表态等均表明，北约在对华战略认知与定位上的复杂和矛盾性：既对中国快速崛起引发的国际权力格局变动抱有极强警惕性，试图进行前置性战略部署，以增强可预期性；又期待利用中国分担北约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压力。[3]

北约主要成员国追求战略自主的政治意愿将牵制北约的战略走向。欧洲主要国家在对美战略追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战略自主的可能路径，特别是以欧盟成员国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时，更强调自身特色。北约 31 个成员国中有 22 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这些国家在“经济合作”与“安全竞争”、“阵营对抗”等问题上将对美国主导下的北约形成一定程度的政治牵制。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明确表示，“欧盟与美国存在差异……欧盟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做出决定，这并不需要等待别人许可。”[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也宣称，“欧方坚定致力于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5] 多数欧洲国家在对华关系上仍保持相对理性姿态，少数欧洲国家以欧盟或北约名义绑架欧洲的尝试并未达到政策预期，这表明平衡管理对华关系仍是欧洲国家的

---

[1] 2022 年版北约《战略概念》。

[2] 《王毅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23 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209/t20220923_10770523.shtml。

[3]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2 页。

[4] European Council,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January 20,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1/20/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european-parliament-on-the-inauguration-of-the-new-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

[5] 《王毅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3 年 8 月 6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1206_679930/xgxw_679936/202308/t20230806_11122921.shtml。

主流政策基调。[1] 欧洲未使用“脱钩”的叙事方式即是其在对华政策上自主定位的表层体现。在美国继续加大对华科技政策施压力度、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背景下，德、法等国及欧盟领导人先后访华的外交行动更展示了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德国明确“欢迎中国实现发展繁荣，反对任何形式的脱钩”[2]，“愿做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阵营对抗”[3]。土耳其则公开称，“不认同中国经济、科技‘威胁论’，反对抹黑、遏制中国发展”[4]，“不支持北约在亚太地区加强活动”[5]。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释放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外交信号，这都表明欧洲存在以合作超越对抗的政治意愿及现实需求。

此外，纾解全球治理困境需要各国（国际组织）通力合作，中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以和平发展实现经济崛起，已成为国际秩序拼图中的重要版块。在发展进程中，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全球气候变化、阿富汗重建、军备控制、网络安全、打击海盗及公共危机处置等具体现实挑战问题上，北约更难以与中国“脱钩”。北约也强调，“我们不会进入新冷战，中国不是我们的对手，也不是我们的敌人”[6]，“我们对与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持开放态度”[7]。

---

[1] 王朔：《中欧合作的历程、成果与展望》，《人民论坛》2022 年第 21 期，第 97 页。

[2] 《李强同德国总理朔尔茨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并举行会谈》，外交部网站，2023 年 6 月 21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21_11101605.shtml。

[3] 《李强会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外交部网站，2023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086/xgxw_679092/202306/t20230619_11100056.shtml。

[4] 《王毅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谈》，外交部网站，2023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2307/t20230726_11118201.shtml。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见王毅》，外交部网站，2023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fmprc.gov.cn/wjbzhd/202307/t20230726_11118270.shtml。

[6]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Door Step Statement by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head of the Brussels Summit,” June 14, 2021,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184960.htm.

[7]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Vilnius Summit Communiqué.”

四、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影响

虽然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深度与进度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束缚，但在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以俄罗斯为现实威胁的背景下，日本与北约的战略关系仍将有序提升，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及网络、太空、信息、产供链、关键技术及基础设施等领域内，双方将深化合作，并将尝试构建一种超越传统军事同盟关系的新型安全关系架构，其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

（一）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趋势

在世界大变局中，国际格局中的权力关系、权力内容、权力结构进入大变革、大动荡、大调整的急速转型轨道，国际力量间的分化组合及国际体系转型呈加速效应，由此引发的国际及地区秩序更加动荡不安，这与大变局之间形成联动并相互激荡，加剧着国际及地区局势的不稳定。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主导着北约“亚太化”发展，试图在动荡中攫取更大权力，而这也是北约生命力的源泉，即北约作为美国的战略工具，是以不断挑起争端、制造混乱来维系其存在的。日本也试图借由动荡期推进摆脱“战后体制”的既定政治目标。由此，作为现实性强大军事力量的北约与潜在性力量的日本之间以主观建构的“印太”区域为物理平台、以新技术造就的新兴领域作为安全合作内容，为各自私利而谋求战略关系突进，为国际秩序转型注入更多军事安全性力量要素，将在改变国际秩序转型方式的同时，提升其转型速度，并加大国际社会的震荡及割裂程度，“北约将触角伸向全球将制造一个分裂的世界”[1]。

（二）北约“亚太化”将恶化地区安全局势、破坏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于欧洲而言，日本力量的介入更多是具有象征性政治意义，在现实维度上短期内不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但作为国际和平发展负资产的北约“亚太化”

[1] 钟声：《北约是全球安全稳定的“系统性挑战”》，《人民日报》2022 年 7 月 5 日，第 17 版。

进程，其影响则可能是颠覆性的。21 世纪以来，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地区国家在实践中以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原则为指导，逐渐摆脱意识形态桎梏，形成了包容、开放、平等的合作框架，也建构起不同于美西方的新型合作理念与理论。相对而言，北约是冷战思维的物化存在，其生存动力与合法性基础来自不断扩张，这直接造成了乌克兰危机的升级乃至质变，进一步确证了北约扩张将带来非北约国家和地区的动荡、冲突乃至战争。北约试图利用阵营对抗和“中国威胁论”为政策工具和切入点，实现“亚太化”转向，再次将冷战思维主导下的军事集团对抗模式导入亚洲地区，这将意味着意识形态、动荡、暴力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回归，破坏地区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合作模式，推动亚太地区滑向“集团化”的危险方向，甚至将地区各国推入“新冷战”困境，[1] 这从根本上不符合地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安全利益与政治意愿，将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负面效应。此外，日本作为北约力量的亚太支点与桥接点，鼓动北约深度介入“印太”事务，[2] 将使亚太地区及周边的力量存在更加多元、复杂，打破地区国家长期以来在互动中形成的、仍较为脆弱的政治平衡关系，不利于国家间相关矛盾与争端的解决，甚至恶化既有矛盾、催生新矛盾，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日本为追求“政治大国”的权力私欲，以邻国为假想对手与威胁，将北约力量大幅导入亚太地区事务，这违背区域内各国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政治意愿，将加大日本与亚太国家间的信任赤字，迫使相关国家采取对应性行动，驱动区域内国家间关系的内涵由包容性的经济合作转向对立性的安全竞争，降低各国对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额度，不利于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复苏，也将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障碍。

（三）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

日本将与北约的安全协调关系视为昭示“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契机。

---

［1］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

［2］ 防衛省、「防衛白書 2022」、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wp2022_JP_Full_01.pdf、328 頁。

为彰显西方主要国家的统一立场、追随美国的“政治正确”、以“西方国家”为身份标签提升国际影响力，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在政策宣示、对俄制裁等方面都紧跟美欧国家步调，并经由 G7 实现了与北约主要国家间就乌克兰问题的桥接。为彰显影响力及政治站位，岸田打破外交惯例，于 2023 年 3 月继美国总统之后完成访问基辅的“外交打卡”，实现二战后日本首相对军事冲突国家的首次访问，日乌关系升级为“特殊的全球伙伴关系”，承诺继续向乌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并将主持召开乌克兰战后重建国际会议，利用日本的重建经验，塑造日本在战后乌克兰重建进程中的领导力。日本作为 2023 年 G7 会议轮值主席国，将乌克兰问题列为会议主题之一，实现了与北约 2023 年维尔纽斯峰会主题的对接，日本不断向国际社会输出“欧洲大西洋和‘印太’的安全保障是不可分割的，乌克兰被侵略不仅仅是欧洲的问题，还是全球问题”[1]，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也表明日本外交操弄手段的有效性，将进一步刺激日本扩大“权力”的欲望。军事安全领域，借由与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协调行动，日本实现对外防卫装备转移的突破。2023 年 4 月，日本设立“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即 OSA）制度，宣称“为深化与同志国在安全保障上的合作……提高同志国在安全保障上的能力和威慑力，将在 ODA 之外，新设 OSA，对同志国进行装备、物资和基础设施整备等援助，使其成为加强综合防御体系的措施之一”。[2] 据此，日本向乌克兰提供了军用车辆。在北约峰会公报中，各国重申对乌克兰入约的政治承诺，宣布向其提供长期安全保障。为展现日本与北约的协调行动，日本承诺将为乌克兰继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财政支持、复兴支援、非杀伤性防卫装备等支持。2023 年 7 月，日本联合执政党会议基本就“主动提供防卫装备援助”达成共识。8 月，岸田与乌总统通话时进一步宣称将就日乌“安保协议”进行谈判，9 月，林芳正访乌再次

[1] 「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外務省、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2] 「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の実施方針」、外務省、2023 年 4 月 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87363.pdf。

提及两国“安保协议”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追随北约，加大对俄制裁将使日本陷入被反噬困境。日本借由“中国挑战”、朝鲜威胁、俄罗斯威胁及乌克兰危机，推动与北约安全战略关系的突进，对日本而言并非意味着更可预期的安全利益。日本不断煽动反俄舆论、采取反俄行动，特别是对乌克兰援助军用车辆等防卫装备，被俄视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将导致冲突升级。作为反制，俄加强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军事部署，二战后首次在日俄争议岛屿及附近灯塔上升起国旗等，均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突进的副产品。此外，俄对日本采取的反制措施，尤其是在能源、渔业、海洋安全、人员往来等方面的措施将对日本经济发展形成反噬效应。

（四）给中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的外部借口之一是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给“以规则（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的“系统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北约安全关系突进本身即是试图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设计中的一环，必将加大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政治上，北约对华定位的改变将影响北约成员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束缚和限制欧洲国家发展与中国建设性关系的主动性，为中欧关系植入负面因素，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部分成员国尝试挑战中国政治安全底线，立陶宛、捷克等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背后显然都有北约的因素。[1] 北约与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深化安全合作，将其纳入北约全球运作框架，也一定程度上给这些国家主动恶化与中国关系注入了刺激性力量。安全层面，日本携手北约将中国视为“挑战”，加大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围堵、军事部署、力量投入、话语霸凌、抹黑打压等操作，联手对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进行政治拉拢、提供安全产品与安全能力建设援助等，恶化了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经贸科技领域，日本与北约成员国联手在尖端科技领域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强化经贸科技安全化发展势头，将破坏中国与

［1］ 王媛媛：《北约战略新动向评析》，第 41 页。

相关国家正常的经贸科技合作。

五、结语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是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非传统安全领域变量迭出而传统安全因素仍未退场的背景下呈现出的发展新态势，是北约“亚太化”与日本调整国家安保战略之间同频共振的产物。虽然短期内日本与北约尚难以提升至传统军事同盟关系，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安全变量呈多元化发展，加之部分国家主观推动非安全领域的“泛安全化”，这必将进一步驱动日本与北约安全战略协调及合作更为密切、深入，且将在多层次、多领域、全频段、跨区域展开。未来双方将超越传统军事同盟关系模式，构建以议题应对为导向的合作关系模式，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新兴战略疆域、国际规则、“虚假信息”等领域的合作有可能不断加强。日本和北约以共同“威胁”和“挑战”作为国家（国际组织）间关系的黏合剂，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加大安全投入、构筑“威慑力”的政策选择将加重地区安全困境，迫使各国加大在安全领域的资源投入，这并不符合包括日本及北约成员国在内的各国根本利益。日本与北约应顺应亚太国家普遍追求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主动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贡献，而不是将军事竞争与动荡引入亚洲。

【责任编辑：肖子璇】